

融、出口创汇、利用外资等工作带来什么影响，多提供一些意见；希望能够共同探讨从危机中可以吸取的教训，提出用什么办法和采取什么措施可以避免发生类似危机。

梁钦荣先生代表港澳委员表示：“香港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还是站住了脚的，内地各方面的形势也比较好，可以说香港和内地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稳定作用。这次危机对香港是有打击的，对产业和股票都有影响，但我们认为，这样的影响不会持续太久。原来，世界各地的投资者都看好东南亚，但现在他们在那里的投资无形中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再想投资的人必然有顾虑。政治和经济上的不稳定是经商投资者的大忌，中国大陆目前很稳定，在此投资不会受到货币贬值的困扰，所以我们说，现在既有困难，也有机遇。

“香港之所以能在危机中站住脚，是因为有强大的祖国做后盾。这次会议期间，我们更多地谈到了香港委员如何起作用，如何更好地与北京联系在一起。我们都有一种紧迫感，非常希望和北京有更加密切的合作。令人高兴的是，我们此次又担任了北京市政协的委员，有机会更直接地为北京服务，为京港两地的合作服务。”

是的，经过多年的磨合与融合，北京市政协的港澳委员们已越来越将北京的事情看作是自己的分内之事。正像香港繁荣集团董事长、总经理陈玉书所言：“香港好，祖国好；祖国好，香港更好。我真诚地预祝北京市的明天更美好，我们应该高高兴兴地迎接香港的明天。” ■

# 新北京杂忆

李滨声

提起新北京有两个概念。60岁以上的人也许还会记得，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从“长远计划”开始在京郊今复兴门外至石景山区要建设“新北京”。先后建了伪铁道部的什么机构两层楼房几排，坐落在南礼士路至木樨地一带路南，又在古城迤西的焦家坟盖起一座日本侵华阵亡人员的“忠灵塔”。历史无情而公正，两项敌产一个早已无踪影，一个除塔留庙，成为今天的老山骨灰堂。

必要的历史情况交代过后，腾出笔来要谈的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新北京了。

## 1

1949年春北京和平解放，大地春回。从政治氛围到市井民风都焕然一新。首先是昼夜不再停电了，改变了自1947年夏不时停电的状况；夜里不查户口了，人们得以安生。虽然夜里有人上街遇解放军岗哨盘问，只要答说“老百姓”便可畅通无阻，因解放军入城后很快取消了宵禁。白天市面日渐繁华起来，锣鼓声、高声喇叭播放的革命歌曲声“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咱们工人有力量”起伏此起，连那有轨电车，俗称“当当车”（“当”读“地昂”）的铃声都透着欢快。

人们的服装开始发生变化，各

行各业的人都争穿四个兜的“干部服”，戴“八角帽”。女的则流行穿“列宁服”和戴不分男女的帽子。至于颜色，凡享受供给制的一律是灰色的，一般则是蓝色。穿西服、穿长衫的少了，大学生中穿“鹿皮衣”（实为反羊皮茄克）和镶皮领皮件子的也不见了。女大学生时兴起穿背带工裤，一切一切都革命化起来。

有钱人的裘皮大衣集中进了拍卖行。东单的“三洋拍卖行”、西单的“乾元（拍卖）行”，悬挂待售的不计其数。价格便宜到了极点，一件上等的水獭领子狐裘大衣只相当于几百斤小米的价格，或两件半“棉猴”的价格，有人评曰“正所谓货卖时价是也”。

穿皮鞋的人少了，高跟鞋更不见了。流行起毛边底的布鞋，而且是便脚的，即不分左右。这种鞋是供给制的产物。特别有意思的是有人领鞋或买鞋故意挑大的，穿起来不合脚，钉个布条系上，以示因陋就简，艰苦朴素。新参加革命的极力想穿发的土得掉渣的鞋，进城的年轻干部有的把“包干津贴”经年

累月积攒起来买双皮鞋穿上。供给制的“大灶”、“中灶”、“小灶”是按参加革命资历分的。除伙食不同，衣服也有不同。大约相当于现在科级的都发给呢子制服（包括帽子）一套。小青年多有美

道城的干部  
喜欢皮挂  
新参加工作  
的干部要穿  
布鞋。  
五十年代生活初稿



小王攒包干费  
第一个戴上了呢帽子



男干部都可穿干部服  
男干部可不能再穿列宁服

慕，但无从争取，只能自己积蓄，而想买一套呢制服无异痴梦，只好买一顶呢帽子。所以那个年月有些青年无冬历夏，穿着单衣也戴着一顶呢帽子去听报告、开会、看电影、开联欢会。有朋友戏说那人“这星期六甬戴帽子了，留神拈出痂子”。

## 2

北平解放伊始，市场变化很是显著，商业除珠宝钻翠行、文玩行以及高消费场所不景气外，都日益繁荣，特别有几个新兴的或再兴的行业更是暴发火炽。其中铜行卖响器的店铺锣鼓鏊供不应求，因解放后秧歌活动到处都是，“锵、锵、其锵其”经常不断。

各商场里出现专画大幅油画领袖像的店铺，专门供应机关团体节日游行或布置会场。“提前定货，以免向隅”是这类店铺的广告。另外，还有锦旗店专门制定各类锦旗、奖旗和订染订印各色彩旗。提起彩旗勾起这样一段记忆——

1951年夏，我由北京人民美术工作室调北京市总工会文教部工作不久，正赶上“七一”建党30周年。庆祝大会是在先农坛召开的，会场一片红彤，党旗红旗如海。会

是下午2时开的，中途下起雨来。雨虽越下越大，却丝毫不影响会场的庄严气氛，郭沫若在由人给撑着伞下坚持朗诵着长诗。散会的时候，我与队伍失了联系，独自扛着旗回到台基厂市总大院。我发现不止我一人掉队，三三两两回来好几拨。实在是雨大，有的地方积水已没了脚脖，湿淋淋的旗子随风雨吹来摆去不时贴在身上，把我的白衬衫左肩和后背染红很大一片，洗也洗不掉。拿到东单的洗染店漂白，人家说漂不出来，建议染成棕色。染出的效果还真不错。据说染前还是漂白一番，一来是看看能到什么程度，“如还可以就省得给您染了”，二来是漂过后染少露痕迹。总之，很为顾客着想。记得当时我除表示满意还故意批评印染旗子的商店，意在表示感激之情。因当时我还是供给制，买件衬衫不容易。

## 3

北平解放初期，大中学校学生中流行跳边疆舞，既活跃校园的文化生活，也是院校联系的纽带。边疆舞以新疆舞为主，常跳的有《大板城的石路平又平》、《掀起你的盖头来》、《阿拉默罕》、《喀什克尔》等。而在工厂和大的团体则流行起扭秧

歌。

秧歌是一种传统的季节性的娱乐活动。起源说法不一，有的说是田埂上运秧苗载歌行走来，也有的说是宋时梁山好汉攻大名府乔装入城留下的。秧歌分“高跷”和“地蹦子”，也称“地秧歌”。角色和内容多有不健康成分。以北京的俗文化小调《老妈开榜》演绎为“阔大爷”（“大款”）、“小老妈”（小保姆）和“傻柱子”（小保姆乡间原来的对象）三个角色之间一些庸俗的表演。

解放后，秧歌以全新的面貌出现了，来源有二：一是陕北秧歌；一是东北大秧歌。群众扭秧歌一般都是便装。带表演性的扭秧歌，男的是延安的习俗，穿中式裤褂，头裹白毛巾；女的则花布裤褂，毛巾的系法与男的不同，腰间多系着红色绸子。新的秧歌从形式到内容都起了变化，由原来的散扭变成排着队扭的“大秧歌”，队形并有多种变化。新秧歌适应新形势，多在政治性喜庆日子如“五一”、“七一”、“十一”扭，增添节日气氛。为了不劳民不扰民，平时不活动。

（插图作者自配）